

《洛阳伽蓝记》研究新动向述评^{*}

李煜东

提要：近15年来《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成果可观。就本体研究而言，学界在其作者杨衒之的姓氏、历官，全书文本与体例的厘定，以及字词注释等方面均有突破。在阐发研究中，无论是以《洛阳伽蓝记》作为直接对象，还是将《洛阳伽蓝记》作为主要依据材料的研究，在史学、宗教、文学等传统路径上都取得了进展。同时，学界还在较新的空间研究方面成果迭出。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反思研究方法、立足文本、有效结合多层次的材料，将是进一步取得突破的关键。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 研究综述

《洛阳伽蓝记》具有重要价值，长期为世人重视，学界成果丰厚。王建国对20世纪以来至2008年前《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①其后，陈思林^②、赵莉^③先后发表的综述亦主要侧重在20世纪至21世纪初。从2008年至今的15年间，学界不仅在《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文本等基础研究上多有突破，随着理论更新和视野拓展，在阐释上也推陈出新。梳理这15年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动向，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展开对《洛阳伽蓝记》的深入考察，同时也能为其他典籍的研究提供镜鉴。

这15年间学界有如孟光全《洛阳伽蓝记研究》^④、吴晶《〈洛阳伽蓝记〉研究》^⑤、袁洪流《〈洛阳伽蓝记〉研究》^⑥这样的综合性专著，但主要是单篇论文（部分论文后来亦被收入相关学人的专著之中）。本文所述基本限于以《洛阳伽蓝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加之个人取舍，难免疏漏。刘跃进在《中古文学文献学》中把古代文学研究分为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⑦《洛阳伽蓝记》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亦不妨借鉴这种区分，将相关研究分为本体研究和阐发研究两大类：本体研究属于基础研究，主要包括作者、文本、体例、注释等；阐发研究则属于阐释，从《洛阳伽蓝记》本身拓展出去，涉及史学、宗教、文学、语言、空间等多个方面。

一 《洛阳伽蓝记》的本体研究

作者生平与思想往往是切入典籍研究的重要进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然而由于正史无传，《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生平非常模糊，不仅生卒年、历官不甚清晰，甚至姓氏也有争议。这不仅影响了《洛阳伽蓝记》的性质分析（如崇佛与反佛之争，文学传统之争），也影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洛阳伽蓝记》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6AZW004）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王建国：《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 参见陈思林：《二十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 参见赵莉：《百年〈洛阳伽蓝记〉研究述要》，《郑州师范教育》2017年第1期。

④ 参见孟光全：《洛阳伽蓝记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

⑤ 参见吴晶：《〈洛阳伽蓝记〉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

⑥ 参见袁洪流：《〈洛阳伽蓝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⑦ 参见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引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响了《洛阳伽蓝记》写作年代的判定。王建国通过综合考索，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辨明杨銜之当姓“杨”而非“阳”或“羊”，指出文献记载杨銜之曾任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司马和秘书监四职，并根据《洛阳伽蓝记》内部的记录论证全书创作时间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到武定五年七八月。^①自此以后，无论是以较大篇幅论述杨銜之的研究如龙昇《杨銜之形象在中国佛教史中的演变》^②、林丹妮《〈四库提要·洛阳伽蓝记〉疏证》^③、林大志《论杨銜之的生平仕履与史家意识》^④，还是以《洛阳伽蓝记》为对象而简略提及杨銜之经历的研究，都基本沿袭上述关于杨銜之生平、历官的说法。至2022年，李煜东指出东魏武定四年至武定八年魏齐禅代，东魏秘书监相继由徐之才和魏收担任，时间没有空缺，故武定五年仍为抚军司马的杨銜之不可能如《广弘明集》所引，在之后“元魏末为秘书监”^⑤。这是近年来关于杨銜之生平比较重要的推进。目前看来，由于涉及杨銜之的史料太少，除非有新出材料，恐怕很难再进一步。

厘定文本是进一步展开注释、阐发的基础。《洛阳伽蓝记》目前可见最早的全帙本为明代嘉靖时期的如隐堂本，最主要的参校本为明代万历时期吴琯所刻古今逸史本。就学界的点校实践而言，如隐堂本和古今逸史本文字颇有差异，两者应属不同系统。其余各本如明津逮秘书本、清汉魏丛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本、吴若准集证本等，都是从如隐堂本或古今逸史本所出，间有改动、校对，在版本校勘意义上的参考价值相对有限。因此，虽然近年有学者新发现清人的手校本，如陈倩指出北京市文物局藏有李葆恂手校道光吴若准刻《洛阳伽蓝记》集证本^⑥，但其意义多在文物价值方面，如保存了李葆恂、刘盼遂等名人的手迹，版本价值往往不高。

在全帙本之外，学界注意到自隋至明的典籍对《洛阳伽蓝记》多有引录，其中有不少文字与如隐堂本、古今逸史本存在差异，足为校勘之重要参考。今日通行的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等校注本即已吸收了这些差异，而随着近年来更多典籍的刊布，亦有新进展。吴晶《〈说郛〉本〈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揭示出明代汲古阁60卷本《说郛》在校勘《洛阳伽蓝记》方面的重要价值。前人在使用《说郛》校勘《洛阳伽蓝记》时仅使用了涵芬楼本《说郛》，但汲古阁本与涵芬楼本存在相当的不同。经吴晶比对，在文字上汲古阁本不仅比涵芬楼本更加准确，甚至优于如隐堂本和古今逸史本。^⑦

《洛阳伽蓝记》的文本厘定工作，除了甄别文字，另一重点在体例。刘知几《史通》谓《洛阳伽蓝记》有正文与子注之分，但如隐堂本、古今逸史本均已将两者混杂。区别正文和子注的问题长期困扰学界，前辈学人就有不同看法：陈寅恪有“合本子注”之说，周祖谟、杨勇区分了正文与子注，但范祥雍等则认为不必强行区分。近年来，吴晶认为杨銜之在序中并未提及使用注文，且从全书内容而言，大多所谓的正文与注文都属于统一的脉络，很难区分，采取“合本子注”的部分主要是在卷5涉及惠生的内容，即全书应以正文为主，偶有注文。^⑧王建国不同意

① 参见王建国：《〈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王建国：《隋唐佛教经籍著录〈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

② 参见龙昇：《杨銜之形象在中国佛教史中的演变》，《中国俗文化研究》2010年第6辑。

③ 参见林丹妮：《〈四库提要·洛阳伽蓝记〉疏证》，《史志学刊》2019年第5期。

④ 参见林大志：《论杨銜之的生平仕履与史家意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⑤ 参见李煜东：《杨銜之“元魏末为秘书监”再献疑》，《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⑥ 参见陈倩：《李葆恂手校〈洛阳伽蓝记〉之价值》，《文献》2010年第1期。

⑦ 参见吴晶：《〈说郛〉本〈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⑧ 参见吴晶：《〈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吴晶：《〈洛阳伽蓝记〉概说》，《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

吴晶的看法，他指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引杨衒之序文与今通行版本不同，其中关键词为“注述”，而今本作“著述”。“注述”即有兼及注解、著述之意，兼具正文、子注之“注述”体实乃中古著作常见的写作体裁。^①

把握具体的字词、典故的内涵，才能全面利用《洛阳伽蓝记》。前述王建国对“注述”一词的考察，即至关重要。此外，王建国还对“火凤舞”“绿水歌”“白马寺经函”“弹指”“石关”等前人未充分考辨之词、事进行了考订。^②

综合而言，近年《洛阳伽蓝记》本体研究的突破一方面基本竭泽而渔地厘清了作者杨衒之的生平、事迹，较前人有了根本性推进。另一方面是在具体文本上：一是开掘了新的可用于校对的文本——明代汲古阁60卷本《说郛》；二是对正文与子注的体例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三是对文本中涉及的部分字词、典故进行了新的考索。这些突破，构成了更加全面、准确理解与研究《洛阳伽蓝记》的基础。

二 《洛阳伽蓝记》的阐发研究

《洛阳伽蓝记》的阐发研究主要是基于不同学科的理路，在近年来颇有推进。而且随着理论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跨学科的视角亦被重视，为传统研究增添了活力，显示出新的研究增长点。

（一）史学研究

如杨衒之在书序中所言，他是因见洛阳颓败，“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加之书中确实反映了北魏洛阳的种种面貌，因而《洛阳伽蓝记》首先是作为一部历史文本而被重视。史学研究之视角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将《洛阳伽蓝记》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二是以《洛阳伽蓝记》作为主要依据的史料，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以《洛阳伽蓝记》作为直接对象的研究包括考订《洛阳伽蓝记》的记载，阐释文本体现的史学思想等方面。彭明浩立足卷1，认为杨衒之对阉党、外戚的态度导致他在编排上将胡统寺进行了特殊处理，同时还分析了卷1中里坊的构成和多个寺庙的等级。^③林郁迢认为《庭山赋》文辞粗鄙，杨衒之将之收录的动机是为了借《庭山赋》讽刺扰乱朝政的权臣和小人，尤其是当时的高欢父亲和魏收。^④《洛阳伽蓝记》卷3将位于“城西”的崇虚寺判定为东汉濯龙园的旧址，李伟否定了《洛阳伽蓝记》的记载，认为当属东汉北宫范围。^⑤结合陈苏镇《东汉的南宫和北宫》的研究^⑥，濯龙园之位置可以定讞。陈建军等根据文献与考古材料，对书中多处记载进行了辨证。^⑦王静根据新出墓志等材料，指出《洛阳伽蓝记》所载归正里的具体位置在伊、洛水之间中央御道西的高地。^⑧余冰、陈建军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魏昌寺与魏昌尼寺并非同一佛

① 参见王建国：《隋唐佛教经籍著录〈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

② 参见王建国：《〈洛阳伽蓝记〉丛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

③ 参见彭明浩：《〈洛阳伽蓝记〉读后——对卷一“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条的分析》，《石窟寺研究》2011年第2辑。

④ 参见林郁迢：《〈洛阳伽蓝记〉收录〈庭山赋〉之动机再探》，《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5年第17期。

⑤ 参见李伟：《汉濯龙园位置及其有关问题》，《中国园林》2017年第7期。

⑥ 参见陈苏镇：《东汉的南宫和北宫》，《文史》2018年第1辑。

⑦ 参见陈建军、王莉萍、高慧：《〈洛阳伽蓝记〉误载举隅》，《洛阳考古》2019年第2期。

⑧ 参见王静：《北魏洛阳城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考》，《唐都学刊》2020年第1期。

寺，而是相距不远、在不同里坊的两座寺庙。^①

史学思想方面，赵莉认为杨衒之采取了先秦以来史传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显示了史家的春秋大义笔法。^②在《〈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探微》中，赵莉则认为书中虚实相间而有赞论的书写模式继承了两汉的传统，展现了杨衒之的史观、史才和史识。^③杨柳认为书中浓郁而不失节制的情怀书写，以及杨衒之亲历兴衰后表现出的政治文化省思，都体现出冷静理性的史家风范。^④此外，角山典幸对杨衒之的撰作意图进行了考察。^⑤田淑晶认为应从后世的建构中剥离出杨衒之创作《洛阳伽蓝记》的原本意图，并区别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⑥

以《洛阳伽蓝记》作为主要史料和论据进行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北魏的思想、城市、社会等多个方面。

思想方面，钟盛从书中记载的陈庆之、杨元慎关于正统的争论出发，分析了北魏后期洛阳的文化状况和北朝的夷夏观念。^⑦赵莉认为全书反复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北朝士人努力将北魏建构为汉文化正统的努力。^⑧

城市方面，具有全局性又能动态地考察北魏洛阳所能依据的主要材料便是《洛阳伽蓝记》。王佳月结合考古资料与《洛阳伽蓝记》梳理了北魏洛阳城格局、功能分区的形成过程。^⑨黄学超利用《洛阳伽蓝记》和新出墓志，探讨了河阴之变后洛阳佛寺变化和乡里重新规划的情况。^⑩金大珍以《洛阳伽蓝记》为基础，考察了北魏洛阳的建筑、环境、经济等方面。^⑪周胤指出在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洛阳城内新增的寺院破坏了洛阳的里坊规划。^⑫其后周胤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到从孝文帝迁都到永熙三年（534）东魏孝静帝迁邺的41年，发表了《城随境迁：佛教影响下的北魏洛阳城市变迁》。^⑬此外，毛阳光依据唐《宋彻墓志》和武周《田玄敏夫人李氏墓志》对洛阳胡坊的记载，结合《洛阳伽蓝记》及相关考古材料，指出胡坊当源自北魏洛阳安置西域胡人的慕义里。^⑭王静根据《洛阳伽蓝记》和新出材料呈现了当时城南社会的面貌。^⑮钱国祥利用考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复原了北魏洛阳城内城与外郭城的规模、

① 参见余冰、陈建军：《〈洛阳伽蓝记〉载魏昌寺与魏昌尼寺之辨析》，《洛阳考古》2020年第2期。

② 参见赵莉：《〈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州学刊》2010年第6期。

③ 参见赵莉：《〈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探微》，《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④ 参见杨柳：《〈洛阳伽蓝记〉的政治文化省思》，《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⑤ 参见〔日〕角山典幸：《『洛陽伽藍記』の撰者楊衒之と執筆の動機》，《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41，2017年。

⑥ 参见田淑晶：《〈洛阳伽蓝记〉作者意图的想象》，《光明日报》2020年8月10日，第13版。

⑦ 参见钟盛：《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 参见赵莉：《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北方论丛》2014年第2期。

⑨ 参见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石窟寺研究》2011年第2辑。

⑩ 参见黄学超：《河阴之变后北魏洛阳城的佛寺与乡里》，《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⑪ 参见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⑫ 参见周胤：《北魏武、明时期洛阳寺院布局与里坊规划》，《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

⑬ 参见周胤：《城随境迁：佛教影响下的北魏洛阳城市变迁》，《南都学坛》2021年第6期。

⑭ 参见毛阳光：《唐代洛阳胡坊与胡坊村考——以〈宋彻墓志〉〈田玄敏夫人李氏墓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4期。

⑮ 参见王静：《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格局,以及城门、官署、里坊、市场、寺院等重要建筑的分布情况。^①

社会方面,赵凯认为北魏洛阳的饮食综合了胡汉元素,食材多元、加工方法多样并注重养生。^②吴昊等侧重于农业物种,考察了卷5涉及鄯善国、左末城、末城的记录,讨论了三地与中原的交流。^③何蓉根据《洛阳伽蓝记》指出北魏的多种经济表现形式:以营造经济、身份经济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经济,以工商业为主的市民经济和以宗教消费为重要表现的宗教经济等,试图揭示中古中国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组织经济的办法。^④

目前看来,史学方面的推进第一是更加重视考古材料的使用,结合考古与文献,做实证研究,不仅辨析了《洛阳伽蓝记》所载内容,而且通过具体考证,使学界对北魏洛阳城有了更加清晰和精准的把握。第二是通过文本细读,进一步阐明书中的史学思想——既包括历史撰述的思考与方式,也包括正统意识等文化层面。

(二) 宗教研究

《洛阳伽蓝记》以佛教寺院为纲展开记述,反映佛教在北魏的盛况,其中涉及大量的佛教建筑、人物和故事,成为宗教研究的重要对象和材料。

综合研究方面,王建国对洛阳伽蓝涉及的地理分布、兴衰过程、风俗浸润和文化交流进行了概要性论述。^⑤吴晶综合分析了书中相关记载的佛教史意义。^⑥袁洪流考察了成书的宗教背景。^⑦王静基于《洛阳伽蓝记》等材料,从佛寺兴起的之背景,佛寺的兴建与空间布局,舍宅为寺的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⑧

行像方面,蒋家华以书中所载为基础,从民俗、美术、意义等角度对汉地早期的行像活动进行了讨论。^⑨仓本尚德也专门对《洛阳伽蓝记》记载的行像仪式进行了分析。^⑩

佛教与世俗、社会交互方面,张磊认为佛教一方面充实了世俗观念,而世俗建筑则丰富了佛教建筑的表象。^⑪武海龙指出宦官在主持修建佛寺时发挥了建筑特长,使得这些佛寺规模宏大而装饰精美。^⑫何蓉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北魏洛阳城市与治理原则,讨论了宗教团体与宗教实践对城市公共生活的意义,批判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城市社会学理论未能察觉中国本土经验的内容与意义。^⑬王新中、王霏认为《洛阳伽蓝记》为佛教城市生活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样板。^⑭

① 参见钱国祥:《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6期。

② 参见赵凯:《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饮食文化》,《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参见吴昊、叶俊士、王思明:《从〈宋云行纪〉路线看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

④ 参见何蓉:《探寻早期城市经济的可能路径:以北魏洛阳的个案研究为例》,《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⑤ 参见王建国:《〈洛阳伽蓝记〉与北魏洛阳的佛教文化》,《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⑥ 参见吴晶:《〈洛阳伽蓝记〉研究》,第35—60页。

⑦ 参见袁洪流:《北魏佛教与〈洛阳伽蓝记〉》,《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⑧ 参见王静:《北魏洛阳佛寺若干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⑨ 参见蒋家华:《〈洛阳伽蓝记〉行像研究》,《求索》2013年第2期。

⑩ 参见仓本尚德:《行像与行城——敦煌行城仪式起源考》,《唐研究》2021年第26卷。

⑪ 参见张磊:《读〈洛阳伽蓝记〉论佛教与世俗的交互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⑫ 参见武海龙:《〈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殷都学刊》2014年第2期。

⑬ 参见何蓉:《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与宗教:基于韦伯理论的反思和〈洛阳伽蓝记〉的考察》,《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7期。

⑭ 参见王新中、王霏:《佛教文献对研究丝绸之路城市的价值》,《五台山研究》2022年第1期。

此外,《洛阳伽蓝记》卷5所载宋云、惠生二人的西行行记,作为可以单独研究的对象,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其中涉及的问题不完全属于宗教,但因文本本身载有大量佛教内容,故于此详论。近年来相关议题中新的讨论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行记的主体史源。吴晶认为主体当是《惠生行记》而非传统认为的《宋云家记》^①,阳清亦持类似观点。^②二是因史料记载有歧,二人西行的起始时间、路线都存在争议。颜世明综合分析二人行记文本的流传过程,辨明了二人不同的出行时间和行程路线。^③三是宋云的身份,《北史》称之为“剩伏子统”,李小白、刘志伟推测“剩”乃“媵”字,表陪嫁之义,认为宋云是胡太后的陪嫁侍从。^④四是由于二人行记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特殊价值,自19世纪起就颇受海外关注,陆志国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评述。^⑤

要之,在宗教层面,学界一方面对原有议题进行了深化讨论,得出更加丰富且颇有独创的结论。另一方面,也引入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的理论,强化了研究的多样性。

(三) 文学研究

相较南朝,北朝文学相对沉寂,遗留后世的作品不多,作为“北朝三书”的《洛阳伽蓝记》自然成为北朝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除了多部综合讨论的硕士论文,目前看来,相关研究一方面是分析《洛阳伽蓝记》本身的文学、文章技法,另一方面则是对书中保存的文学作品加以讨论。

文学、文章技法方面,曹虹论述了杨衒之的辞赋观及文本内部所运用的辞赋修辞方式。^⑥张全耀认为全书将佛教义理通过志怪的手法传递出来。^⑦王柳芳指出全书在文字、结构、主客问答的模式上对京都赋多有借鉴。^⑧李玉婉将全书内容分为轶闻传说和神怪传说两大类,列表加以解说。^⑨李小白认为杨衒之吸收了汉魏辞赋与地志的技法,形成了新的文章之法,扩大了信息量,对后世产生了影响。^⑩赵莉指出《洛阳伽蓝记》已经具备“有意为小说”的创作意识,在汉晋小说的基础上,兼容志怪与志人,将真实与虚幻结合,成为后世唐传奇的先声。^⑪其还进一步考察了书中涉及地理位置的散文的技巧。^⑫杨柳认为全书表现了北魏文人的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文学观念也扩展到抒情色彩和个人性。^⑬王建国对《洛阳伽蓝记》所涉都市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地文学性分析,指出了书中模拟大赋、骈散结合、志怪笔法、时空交错的技法。^⑭

《洛阳伽蓝记》所载文章方面,胡姝梦对书中引用的姜质《庭山赋》加以考察。^⑮顾农指出

① 参见吴晶:《〈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参见阳清:《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考述》,《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③ 参见颜世明:《宋云、惠生行记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 参见李小白、刘志伟:《宋云、惠生西行考论》,《敦煌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参见陆志国:《〈宋云行纪〉的西传与英译研究》,《上海翻译》2020年第6期。

⑥ 参见曹虹:《〈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古典文献研究》2008年第11辑。

⑦ 参见张全耀:《佛教义理与〈洛阳伽蓝记〉的小说技法探微》,《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⑧ 参见王柳芳:《论〈洛阳伽蓝记〉对京都赋的接受》,《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⑨ 参见李玉婉:《〈洛阳伽蓝记〉叙事内容分类研究》,《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⑩ 参见李小白:《〈洛阳伽蓝记〉的文章之法》,《天中学刊》2014年第6期。

⑪ 参见赵莉:《过渡与衔接:〈洛阳伽蓝记〉小说价值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⑫ 参见赵莉:《〈洛阳伽蓝记〉地记散文艺术探析》,《语文建设》2017年第32期。

⑬ 参见杨柳:《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北方论丛》2018年第2期。

⑭ 参见王建国:《〈洛阳伽蓝记〉的都市书写》,《光明日报》2021年5月17日,第13版。

⑮ 参见胡姝梦:《〈洛阳伽蓝记·庭山赋〉研究》,《语文研究》2012年第3期。

其文学价值在于引用了具体的文学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文坛，弥补了北朝研究中文学史料的不足。^①

尽管文学研究的成果数量并不算丰富，但相较前人也有推进。而且，对《洛阳伽蓝记》叙述手法、篇章结构、文体意识等方面的把握，以及针对书中所载各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章的考察，都可为进一步推动北朝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说意义深远。

（四）语言研究

《洛阳伽蓝记》的语言研究主要可以区分为中文词汇、句法和英译两类。

《洛阳伽蓝记》的词汇、句法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多采取统计的方式。期刊论文方面，牛太清先后发表了《论〈洛阳伽蓝记〉中的偏正式双音新词》《〈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当代方言词语拾零》《〈汉语大词典〉引〈洛阳伽蓝记〉书证校补》等文章^②，其成果后来部分汇集入专著《〈洛阳伽蓝记〉词汇历时层次研究》。^③此外，徐瑞统计了书中出现的方位词和频率，讨论了方位词的句法功能。^④苏慧对书中30余条沿用前代典故或首次出现的成语进行了分析。^⑤翟鸿菲、杨占武指出书中54例反义复合词，考察了这些词汇出现、使用和消亡的过程。^⑥由于《洛阳伽蓝记》篇幅适中，方位词、同义词、代词、量词等均成为硕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此不一一展开。

《洛阳伽蓝记》的英译研究是近年的热点之一。目前《洛阳伽蓝记》的英译本有二。一是附在1981年詹纳出版的专著 *Memories of Lo-yang: Yang Hsu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493 - 534)* 之后的译本，二是1984年出版的王伊同译本。两人均在书中对《洛阳伽蓝记》涉及的史事、制度、词语等进行了注释。近年来的研究一是侧重于考察译本的异同，如谢朝龙先后发表《〈洛阳伽蓝记〉英译的译者认知与翻译处理》《作为汉学阐释的典籍翻译——以〈洛阳伽蓝记〉英译为例》和《〈洛阳伽蓝记〉外译考察》等。^⑦吕兆杰则基于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分析高频词的特点，为典籍翻译提供新视角。^⑧另外，针对各译本，尤其是王伊同译本亦有研究成果。汪宝荣等指出王译本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保留和传递了原作中的民族文化意蕴。^⑨姚伟、汪宝荣认为王伊同翻译《洛阳伽蓝记》是受到职业习惯、资本和当时汉籍翻译兴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⑩

① 参见顾农：《〈洛阳伽蓝记〉里的文学史料》，《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参见牛太清：《论〈洛阳伽蓝记〉中的偏正式双音新词》，《语文学刊》2009年第9期；《〈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当代方言词语拾零》，《现代语文》2015年第8期；《〈汉语大词典〉引〈洛阳伽蓝记〉书证校补》，《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③ 参见牛太清：《〈洛阳伽蓝记〉词汇历时层次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④ 参见徐瑞：《〈洛阳伽蓝记〉方位词研究》，《现代语文》2010年第12期。

⑤ 参见苏慧：《〈洛阳伽蓝记〉成语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⑥ 参见翟鸿菲、杨占武：《〈洛阳伽蓝记〉反义复合词历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⑦ 参见谢朝龙：《〈洛阳伽蓝记〉英译的译者认知与翻译处理》，《语言教育》2018年第1期；《作为汉学阐释的典籍翻译——以〈洛阳伽蓝记〉英译为例》，《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洛阳伽蓝记〉外译考察》，《淮海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⑧ 参见吕兆杰：《〈洛阳伽蓝记〉高频词译介对比》，《中国科技翻译》2022年第2期。

⑨ 参见汪宝荣、姚伟、金倩：《〈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英译策略——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的考察》，《语言与翻译》2017年第3期。

⑩ 参见姚伟、汪宝荣：《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汉籍过程社会学分析——以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为例》，《燕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洛阳伽蓝记》之语言研究于近年的发展，在中文词汇、句法方面可以说已经面面俱到，在英译方面的成果则主要是通过引入翻译理论，并注重挖掘译者的文化背景而达成。

（五）空间研究

前文在“史学研究”的部分提到学界根据《洛阳伽蓝记》考察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而此处将要述及的研究则与之不同——不再是史学式的考订，而是引入跨学科视野和新的理论方法，侧重于“空间”的角度。这些角度包括时间、政治、宗教乃至美学，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研究进路。

时间空间方面，王柳芳指出《洛阳伽蓝记》的一个重要时空临界点是“迁邺”。杨衒之多将事件叙述到“迁邺”而不再言及其后的发展。^①

空间政治方面，李智君指出胡太后将佛塔的高度完全政治化，将之表现为权力的高度——无论城内、城南还是城东，她所供养的佛塔在域内都是最高，且最终构建洛阳中轴线塔刹林立的佛国空间。同时，李智君还指出无论城内城外，佛塔高度都按照供养人政治权力的等级从高到低排列。^②

公共空间方面，刘小平认为洛阳寺院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表现出社会公共性的特点。^③张鹤泉认为北魏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发展阶段，依据《洛阳伽蓝记》复原了当时广泛的营造阶层，不同人群营造的差异，以及具体的园林景观。^④岳彦如通过书中记载的动物和植物，指出这些动植物广泛分布在街道、寺院、园林和住宅等空间内，呈现了彰显山水审美风尚、密切联系城市环境、凸显佛教文化特色三个特点。^⑤陈娟指出当时佛寺园林逐步从内部走向外部，出现了园林化的发展，从神秘色彩转向自然，亦兼顾民众的公共生活。^⑥张皓珩从结构形式、叙事效用和文化理念讨论了书中基于空间而叙事的内容，包括伽蓝结构、人情风物和风尚观念等。^⑦高曼根据《洛阳伽蓝记》分析了北魏佛寺针对不同人群的空间功能。^⑧

空间美学方面，席格认为《洛阳伽蓝记》具有城市丘墟审美的独特价值，并体现北魏时期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多元审美观念，应重新重视其在北朝审美观念研究上的价值。^⑨

此外，还有新近研究融汇了多种空间。席格从“人”“地”关系出发，指出北魏对洛阳的空间营造与杨衒之秉持的价值观念契合，让杨衒之产生了深挚的情感关联，进而决定了杨衒之的写作方式。^⑩蔡丹君指出，《洛阳伽蓝记》基于传统都城书写模式，采用多种手法，对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进行建构，不仅具有历史空间的意识，也体现了生活空间乃至民族思想。^⑪

① 参见王柳芳：《论〈洛阳伽蓝记〉的多维时空观》，《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智君：《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③ 参见刘小平：《北魏洛阳寺院社会公共空间述论——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④ 参见张鹤泉：《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⑤ 参见岳彦如：《〈洛阳伽蓝记〉所见北魏洛阳城的动植物与城市环境》，《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5期。

⑥ 参见陈娟：《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时期佛寺园林造园思想及生产活动》，《艺术生活》2020年第3期。

⑦ 参见张皓珩：《〈洛阳伽蓝记〉空间叙事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⑧ 参见高曼：《略论北魏佛教寺院之功能——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法音》2022年第5期。

⑨ 参见席格：《〈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中州学刊》2017年第12期。

⑩ 参见席格：《〈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中州学刊》2022年第6期。

⑪ 参见蔡丹君：《〈洛阳伽蓝记〉都城书写的多民族思想文化特质》，《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从“空间”角度研究《洛阳伽蓝记》并非完全是近年研究之创新，如王美秀在专著《洛阳伽蓝记的文化论述》中就已辟《从历史传承到空间决定论——〈洛阳伽蓝记〉的空间论述》一章进行了讨论。^①但先前研究主要侧重在历史、地理之考订和分析，或是简要地把空间与文化对应，并做今昔之对比。而如前可见，近年之研究已经拓展出更多的“空间”面向，成果迭出，足为《洛阳伽蓝记》研究之学术增长点。

三 反思与展望

近15年来，学界对《洛阳伽蓝记》展开了全方位的考索，成果数量持续增长。从上文所论可见，新近成果较前人研究议题覆盖面更广，理论更加丰富，具体问题挖掘更为深入。简言之，在本体研究上，关于作者杨衒之，以及版本、体例、字词典故方面，均有较大突破。在阐发研究上，无论是史学、文学、宗教、语言还是空间，不仅更细致地分析了原有论题，还拓展出新的研究面向。

当然，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必然等于质量，不等于相关问题的推进程度，近年之研究仍有必须反思之处。其一，部分研究存在人云亦云、述而未考之现象。如关于杨衒之生平，多部专书和论文虽然辟出章节，名之为“杨衒之生平考略”“杨衒之生平事迹考述”等，但只是总结、重复前人已有成果，未形成有效讨论。其二，议题重复，这一问题在文学、艺术、文化、翻译等多方面都存在。例如在翻译研究方面，由于目前《洛阳伽蓝记》的英文全译本仅两种，英译理论又相对有限，很容易导致研究出现重复。《〈洛阳伽蓝记〉中古代城市形态要素类地名英译策略研究——王伊同个案考察》和《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地名之策略》都是参照“文化专有词”的翻译策略分类法，指出王伊同偏重文化保留性翻译，偶尔使用归化法，所据例证亦略有重复。^②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两篇文章共享了作者，但也从侧面说明此类研究的局限性。其三，先入为主。如王美秀即先认为杨衒之当姓“阳”而为阳固之子后，再去寻找相关证据加以论证，从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③其实，也正如其文所言，“阳”姓结论出自文本诠释而非真正的文献论考，在这一基础上寻找间接证据，难免导致论证似是而非。

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论者未能找到更多的研究突破点。根据《洛阳伽蓝记》现有之研究成果，学界对中古文献研究的反思，并结合笔者的研究经验，在电子文本和检索工具繁盛的今日，《洛阳伽蓝记》之研究的突破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意反思研究方法。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应避免“先入为主”外，研究方法的反思尚可在多方面展开。比如尽管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早期典籍引用《洛阳伽蓝记》所具有的校勘价值，但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具有类书的性质，元《河南志》是方志，它们在引用《洛阳伽蓝记》文字时难免有所节略和改动。基于此种特性，这些文献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字如何具体地在校勘时发挥作用，还需要仔细鉴别，并制定相对统一且有效的标准。

① 参见王美秀：《洛阳伽蓝记的文化论述》，里仁书局，2007年，第133—218页。

② 参见金倩、姚伟：《〈洛阳伽蓝记〉中古代城市形态要素类地名英译策略研究——王伊同个案考察》，《陇东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汪宝荣、姚伟、金倩：《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地名之策略》，《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参见王美秀：《从依据文献到诠释文本——“杨衒之为阳固之子”的考论途径及其转向》，《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1年第56卷第1期。

第二，继续深入考察《洛阳伽蓝记》的文本。对一部文献而言，文本的理解与分析无疑是最基础的。只有立足文本，才能在前贤未尽之处发现新问题。具体而言，不仅应更进一步厘定《洛阳伽蓝记》的文字，考索字词含义，笺释名词、史事，而且在这基础上还应注意虽然杨銜之是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但也借鉴、吸收了不少文献，包括文学文献、官方资料（或含国史、实录等）、地志、行记等。这些借鉴材料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全书的价值，因此还应注意考辨《洛阳伽蓝记》文本的渊源，推考其史源。

第三，有效结合多层次的材料。20世纪以来，涉及北魏洛阳城的文物，尤其是墓志大量出土；汉魏洛阳故城的考古发掘成果亦日益丰硕。这两点既给进一步研究《洛阳伽蓝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带来挑战——如何充分发掘石刻文本与考古成果的信息，将石刻、考古发掘成果与《洛阳伽蓝记》研究建立起有效联系，仍有待持续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闽台历代方志集成·台湾志书辑》出版

2021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的《闽台历代方志集成·台湾志书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辑共收录清初至1895年台湾编纂的志书40种、图28959幅，基本囊括该期台湾编纂的地方志书。

清初台湾修志活动尤为频繁，康熙、乾隆年间仅《台湾府志》就编修了6种，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这在修志史上极为鲜见，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该辑还收录了钓鱼岛、赤尾屿等珍贵的古籍图。通过台湾地区地方志的编修，证实自古以来中央朝廷对台湾实施永久而持续的行政管辖权力的过程。该辑所录不少志书的电子影像版系专门从日本、美国和台湾地区征集回来的珍本。其中，光绪《台湾通志（稿）》仅存于台湾图书馆，光绪《新竹县志初稿》仅存于台湾新竹县，乾隆《续修台湾府志》为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珍本。此外，为了提高志书使用价值，该辑还组织福建省有关高校、图书馆专家教授等撰写书目提要，编制目录，以便读者检索查阅。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闽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充分利用闽台方志文化的优势，打造闽台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对于推动两岸同胞文化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一家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供稿）